

雙重標準的政治修辭：剖析美國兩極化氛圍下的邏輯困境與自圓其說

•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引言：極化社會中的邏輯謬誤

近年來，美國的政治生態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劇烈震盪，自由派與保守派、左翼與右翼之間的對立日益嚴重。然而，當我們抽離激昂的政治修辭，冷靜地審視雙方在不同議題上的核心論述時，便會發現一種根深蒂固的邏輯矛盾與雙重標準。雙方在抨擊對手、指責對方踐踏原則的同時，往往在另一個契合自身利益的議題上犯下完全相同的錯誤，隨後再利用一套精緻的論述為自己自圓其說。一些讀者曾經問我為什麼經常批評保守派和右派，但這一次，我將會深入剖析自由派和左派在「程序公義」以及「高度概括化與刻板印象」這兩個關鍵維度上所展現的邏輯不一致性，進而揭示這種雙重標準如何侵蝕了現代民主法治的基石。



程序公義的自相矛盾：選擇性運用與大愛包容

程序公義是現代憲政民主運作的核心支柱，其基本內涵在於：為了保障實質結果的公正，所有政治公權力的行使都必須嚴格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與權限劃分。在特朗普執政時期，自由派與民主黨人高舉程序公義的大旗，對行政當局的諸多決策展開了嚴厲的法律與道德批判。例如，當特朗普政府繞過國會的預算審查或立法授權，直接通過行政命令向多個國家大幅徵收關稅，引發貿易爭端時，自由派強烈譴責這是對權力分立原則的踐踏；當大批非法移民被執法人員迅速逮捕，並在未經充分司法答辯下被遞解出境時，自由派抨擊這公然違反了憲法對基本人權的保護；而當特朗普在未經國會正式宣戰或授權的情況下，對伊朗等國採取軍事行動時，左翼更直指這是對憲法賦予國會宣戰權的公然挑釁。在這些論述中，自由派的邏輯是清晰且堅定的：無論其政治或戰略目標聽起來多麼有道理，只要在程序上違法，其結果就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然而，當議題轉移到非法移民的居留與安置問題時，自由派對程序公義的堅持卻發生了戲劇性的逆轉。在面對大量採取非法手段入境並長期滯留美國的群體時，自由派積極鼓吹一種基於人道主義的大愛包容態度，不僅反對驅逐，甚至主張為他們提供合法的身分與工作路徑。此時，保守派與合法移民群體提出了完全合理的質疑：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申請者，正遵循著繁複、冗長且成本高昂的正式法律程序，在漫長的排隊中等待著合法入境與定居的機會。自由派對非法移民的網開一面與特赦主張，無疑是對那些死守法律程序者的極大不公。在此處，非法移民不經法定程序獲取居留權的事實，同樣構成了對程序公義的嚴重違反。自由派在面對政府公權力時強調「程序不對，結果就是非法」，但在面對非法移民時卻主張「理想崇高，程序可以讓步」，這種在同一個「程序公義」概念上的雙重標準，暴露出其邏輯的內在分裂。

為了自圓其說，自由派建構了一套關於「權力不對等」與「法律本身不公義」的修正主義邏輯。在他們的政治哲學敘事中，這兩個看似衝突的立場被另一種更高級的道德維度串聯了起來。自由派認為，行政首長或國家機器擁有無可比擬的公權力，因此必須受到最嚴格的程序公義限制，否則社會將迅速滑向威權與獨裁。相反地，非法移民在他們的視角中被定義為弱勢群體，現行的嚴苛移民法律與入境程序被斥為排外主義、冷酷且不人道的。在這種邏輯下，死守不公義的程序只會延伸不公義，因此人道主義的實質公義必須凌駕於條文的程序公義之上。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的危險性在於，它將程序公義的適用性降格為可以因人而異、因立場而異的政治工具。如果自由派可以因為人道大愛的崇高理由而忽視入境的法律程序，那麼保守派同樣可以基於維護國家安全等他們認為無比崇高的理想，去忽視或架空限制政府權力的行政程序。一旦法治的程序公義可以被各自陣營宣稱的「實質公義」隨意取代，那麼現代社會最根本的法治基石與遊戲規則將蕩然無存。

高度概括化的自相矛盾：選擇性的以偏概全與對抗系統

除了在程序公義上的雙重標準外，自由派在面對社會群體與公共事件時，對於認知謬誤的應用也存在著顯著的邏輯不一致。長期以來，自由派與左翼知識分子站在反對歧視的最前線，他們經常使用「高度概括化」、「以偏概全」（over-generalization）與「刻板形象」（stereotype）等邏輯謬誤，去嚴厲批評種族主義、白人國族主義以及排外的反非法移民政策。他們正確地指出，不能因為部分害群之馬，就將整個族群貼上負面的標籤，就對整個群體採取具有偏見性的限制措施。這種強調保護個體差異、拒絕將個體過錯上升為集體罪責的邏輯，是現代自由主義與人權觀念的重要體現。自由派以此為武器，佔據了反對偏見與維護多元平等的道德高地。

然而，當社會焦點轉移到執法體制與警察群體時，這種反對「一竹篙打一船人」的邏輯卻在左翼陣營中全面失靈。幾年前，在發生了一系列白人警察採用過度武力傷害少數族裔、特別是引發全球震動的「喬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後，自由派與進步派的輿論迅速走向了極端。大批左翼激進分子與社會活動家走上街頭，齊聲喊出了「撤資警隊」甚至「廢除警察」的激進口號，更有甚者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將所有警察污名化的言論。

此時，如果採用自由派平時用來反對歧視的同一套邏輯，人們必然會問：為什麼因為一小撮白人警察的錯誤行為，就要去懲罰、削減甚至全盤否定整個由無數兢兢業業、冒著生命危險去維持治安的藍衣戰士所組成的警隊呢？這難道不正是最典型、最標準的高度概括化謬誤嗎？

面對這一顯而易見的邏輯打臉，自由派與左派學者發展出了「系統性壓迫」的社會學論述來為自己辯護。他們辯稱，自己並非在攻擊每一個具體的警察個體，而是將警隊界定為一種「國家機器」與「體制」，這與自然形成的少數族裔群體有著本質的不同。在左派的分析框架中，少數族裔內部成員沒有統一的組織架構、共同的信條或體制性的權力，因此對他們的概括化是純粹的偏見。然而，警隊是一個擁有公權力、合法武裝、受過統一訓練且受到強大工會體制保護的架構。自由派認為，種族主義與過度武力並非個別警察的偶然失誤，而是深植於整個警察系統的訓練文化、考核機制與保護傘制度之中。因此，「撤資警隊」針對的是這個源源不絕產生不公義的系統，而非懲罰個體。

然而，這種自圓其說顯得極其蒼白與虛偽，當「撤資警隊」的口號演變成對所有執法人員的妖魔化與敵視時，它在客觀效果上就是不折不扣的高度概括化。這種做法全面忽視了在犯罪率高企的弱勢社區中，正是無數優秀的基層警察保護著少數族裔免受暴力犯罪的侵害。

結論：立場先行的政治部落主義與民主的危機

綜上所述，透過對程序公義的選擇性失明以及對以偏概全謬誤的雙重標準進行客觀分析，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當前美國政治對立的背後，並非單純是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思辨，而更多是一種「立場先行、雙重標準」的認知失調與政治部落主義。自由派在批評保守派與特朗普政府時，能夠精準地揮舞程序公義與反對偏見的理智之劍；但在面對符合自身意識形態神話的保護非法移民或反警浪潮時，卻能迅速將這些原則拋諸腦後，並用一套「系統性受害者」或「系統性壓迫」的精緻理論來為自己的邏輯矛盾進行巧妙的自圓其說。

如果一個社會的精英與大眾不再相信有一套跨越黨派、跨越階級、跨越族裔、一視同仁的程序與邏輯標準，而是任由意識形態的「崇高理想」隨意綁架和曲解法律與理性，那麼民主制度終將在無休止的內耗走向崩潰。要走出這種極化的泥潭，關鍵在於公眾與政治

人物能否重拾真正的客觀與省思能力，不僅要用高標準去檢視政敵的邏輯缺陷，更要敢於直面並修正自身陣營的自相矛盾。唯有當原則不再因立場而轉移，理性的政治對話才有可能在民主社會中重新復甦。

2026年5月16日

原載於香港《有情無國界》

[更多資訊](#)